

言与语：关于早期文体生成的一个观察

陈绪平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细致考证早期职官的“言语”活动、诸子时代作为思想资源的“言语”文例及周秦汉时期“言语”文献的大量出现诸史实,可以见出早期文体生成的一个重要方式,即官方体制化的运作造成了“言语”知识的不断产出,而诸子时代的引证(“言语”作为思想资源)、模仿(“言语”作为模仿对象)等,直接造成了早期“言语”类典籍的大量出现,而这正是“言语”文体稳定下来的最好体现与保证。简言之,早期文体经过了从人的行为方式名到文体名的发展过程,而文体稳定的标志则是出现了相关文献。

关键词:言语;早期文体;职官;诸子时代

中图分类号: H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8)02-0099-08

在统计早期字书所著录的文体名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些作为后世文体名的语词会在《释名》中被释义两次,安排在两个不同的篇卷里面。比如记录有早期文体“铭”的资料如下:

铭,名也,记名其功也。《《释言语》》^①

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释典艺》》^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释言语》这部分《释名》中解释了“铭”作为“行为动作”意义上的涵义,于是它同“颂”“赞”“勒”等并列;而在《释典艺》中则解释了“铭”作为文献类型的语义,在这里“铭”又同“诏书”“论”“叙”“谥”“谏”等并举。《释名》这本早期字书,“因声求义”,注意古今音的不同,注意探究事物的起源,是语源学的要籍。它不仅仅是语言学的重要工具书,也是早期文体学研究的一把钥匙。那么它为何要两次而且在两个地方释义同一个词“铭”呢?这个细节又对我们研究早期文体(文献)的生成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认为“铭”这个词,经过了从人的行为方式名到文体名的发展过程,而文体稳定的标志就是出现特定的相关文献。这也就是“铭”既出现在《释言语》,又出现在《释典艺》中的原因。

从这个思路出发,很多文体研究的争议可以迎刃而解,早期文体研究也会在这个思路下获得更多的新认识。比如,关于赋体的内涵问题,《汉书艺文

志》有“不歌而诵谓之赋”的说法。在对这则材料解读时,很多学者将之视为动作(动词)的“赋”,认为和作为文体的“辞赋”之“赋”无关,将之排除在研究“赋”文体的史料之外^③。其实,这里的“赋”虽是动词,也可以理解成文体名,正如上面所说的《释名》对“铭”等文体的解释。可以说《汉书艺文志》的这个说法是认识“赋”体本质的关键资料。在早期典籍中尚有相当多的类似表述,比如《诗·邶风·定之方中》之《毛传》说:“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谏,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④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这里的“大夫九能”也都在后世发展成了特定的文体。

其中“铭”“赋”“誓”“说”“谏”“语”见于《文心雕龙》《文选》等,是最为常见的古代文体样式。需要考辨的是这里的“山川能说”之“说”与《文心雕龙·论说篇》中的“说”体不是同一个文体。这里的“说”是讲上古大夫要有诵述山川形势、当地风俗、传说故事等的的能力。《周礼·地官》云:“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愿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王巡守,则夹王车。”郑玄注曰:“道,说也。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⑤“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愿,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郑玄注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⑥孔颖达疏:“志即今之识也,谓道

收稿日期:2017-12-23

基金项目:国家博士后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2017M622496);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7ZDA241)。

作者简介:陈绪平,男,山东单县人,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站博士后,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四方所记识久远之事以告王也。”据此,我们可以说“土训”“诵训”就是具有“山川能说”能力的职官。前者诵说“地图”,后者诵说方志。它们都发生在王巡守的仪式场合^⑦。联系《定之方中》诗文本和《毛诗序》^⑧,可知这里的“命龟”是卫文公迁徙都城至楚丘后的“卜云其吉”。这就是《周礼·春官·大卜》所云“国大迁,大师,则贞龟。”^⑨《诗·大雅·绵》亦有大王迁至岐之后占卜吉凶的记录“爰契我龟”。又《周礼·春官·筮人》记录了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郑玄注曰:“更,谓筮迁都邑也。”^⑩这些资料显示:“命龟”是“大卜”“筮人”诸职官在迁都、建都等重要事情发生之时所进行的占卜。其中关于“卜”与“筮”在细节上的区别,有孔颖达的解释可参^⑪。由此可见,“命龟”活动是早期占卜文的一个重要来源。至于“施命”“造命”,是早期“命”公文的两类型,且都是下行文^⑫。上述“大夫九能”资料揭示了早期文体与职官的对应,即古大夫所掌握的九种仪式技能对应着九种仪式场合需要的特定文体。

早期文学史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文献不足征,然而一些重要的问题,却往往能从细读文献中找到相对完整的资料,得到较好的解决。关于早期文体经由从行为动作名到文体名发展,最终形成文献的认识,即是一例。虽然我们 cannot 为“铭”找到更为丰富的资料,以证实《释名》分类释义的内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全面收集早期典籍中关于“言”与“语”的资料来证明这个认识。

一、作为行为方式的“言”与“语”

在早期中国,口耳相传是早期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于是,说话成了当时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这一点表现在早期典籍中就是:早期人们重视区分言说的不同方式,而且区分得非常细致。这是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下资料所云:

《诗经·大雅·公刘》曰:“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曰:“直言曰言,答述曰语。”^⑬

《楚辞·七谏》曰:“言语讷讷兮。”王逸注曰:“出口为言,相答曰语。”^⑭

《说文解字·言部》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⑮

《释名·释言语》曰:“言,宣也。”^⑯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言”与“语”是说话方式的区分。“言”是直接说出自己想表述的内容,不包括与别人的讨论、辩难等。而“语”是“答述”他人问话。据上引《说文解字》的解释,“语”后来又

包括讨论、论难等内容。在周代,大司乐以“乐语”教育贵族弟子的时候,就有“言”与“语”的科目。记录见《周礼·春官·宗伯》,其文曰:

(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⑰

郑玄注曰:“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割今也。”

又曰:“倍文曰讽^⑱,以声节之曰诵。”

又曰:“发端曰言,答述曰语。”^⑲

大司乐教授国子的六种技能:“兴、道;讽、诵;言、语。”其内容应该分为三组:第一组“兴道”、第二组“讽诵”、第三组“言语”。据郑玄注,可对之做如下分析:“兴”,就是“喻”的意思,即通过选择好的事物以让人知晓自己要言说的道理;“道”即“导”,就是以“古”讽诵“今”,这与“兴”相似又相互区分。“讽”“诵”,一个是背诵,一个是在音乐伴奏的情况下有节奏的吟诵。而在乐语要求下的“言”与“语”,直接说、发言曰“言”,在相互交流的时候回答问题(辩论)是“语”。

关于以上六种“乐语”技能,孙诒让《周礼正义》曰:“言语应答,比于歌乐。”^⑳这说明这六种“乐语”方式使用的语言是仪式语言,并非日常用语,它们必定发生在特定的仪式场合。以下资料可以证明这个判断不错。《仪礼·乡射礼》有“古者于旅也语。”郑玄注曰:“礼成乐备,乃可以言语,先王礼乐之道也。”^㉑这里的“旅”即旅酬,就是在祭礼之后众宾客之间的相互敬酒。^㉒在这种祭祀之礼上使用的言语显然是仪式用语。又有《礼记·射义》记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觶而语”的故事。其中公罔之裘扬觶而语曰:“幼壮孝弟,耆耄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序点又扬觶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㉓在这里“扬觶而语”^㉔发生在射礼之“旅酬”仪式之上。“公罔之裘”与“序点”的“语”讨论的是关于“孝弟”“好礼”“好学”的道理。这就与郑玄注所云“古者于旅也语,语谓说义理也”相吻合。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语”就是在仪式场合的“答述”“说义理”。又有以下证据:

《礼记·文王世子》载有小乐正在“东序”向“太子”讲授“祭”“乞言”“合语”之礼。^㉕郑玄注曰:“养老乞言,养老人之贤者,因从乞善言可行者也。”孙希旦《礼记集解》云:“乞言求善言可行者也。合语谓于旅酬之时而论说义理以合于升歌之义。”^㉖

又《乐记》云:“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②孙希旦《集解》曰:“语,谓乐终合语也。道古,合语之时,论说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并道古昔之事也。”^③孙氏的解释“乐终合语”是正确的,因为《文王世子》就有“既歌而语,以成之也”的说法。这也意味着在这些仪式场合上的“语”是早期礼乐礼仪的一个部分,同乐歌相配合以完成相应的礼仪。

据《地官司徒》所云,“师氏”教授国子的是“三德”“三行”^④,“保氏”教的是“六艺”“六仪”^⑤。据《春官宗伯》所云,“大师乐”教的是“乐德”“乐语”“乐舞”^⑥。据《国语》,“语”和“春秋”“世”“诗”“礼”“乐”、“令”“故志”一起构成了当时楚国王公贵族弟子学习的主要礼乐知识。从这些记录,我们可知上古时期的“国子”要接受一整套完整的教育,以满足各种礼仪活动的需要。其中“乐语”是与诗、书、礼、乐联系在一起学习的,因为在上古仪式诸场合的“言语”是需要特定的知识和能力的。所以有“不学诗,无以言”;又有孙诒让所云:“言语应答,比于歌乐。所以通意旨,远鄙倍也。”^⑦其中“远鄙倍”的典故出于《论语·泰伯》^⑧,指的是只有具备了礼乐修养,在仪式场合的“言语应答”才会远离“鄙”和“倍”,“鄙”为“鄙陋”,“倍”指“乖戾”。

上面分析了早期典籍中的“语”与“言”都是发生在特定场合的仪式语言,不同于我们日常所云的“说话”。细读早期典籍,我们发现除了前述的仪式场合的“言”与“语”之外,还有在早期政治生活中的“纳言”制与“传语”说等,也是早期“言”与“语”的重要来源:

《尚书·尧典》载录尧帝的话云:“龙,朕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⑨

《皋陶谟》:“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汝听,予违,汝弼……工以纳言,时而扬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⑩

《北堂书钞·设官部》引郑玄注云:“纳言,如今尚书,管主喉舌也。”^⑪

从《尚书》及郑玄注的资料来看,“纳言”是君王身边的职官对君王的言行所进行的规劝和进谏等。其中《皋陶谟》“工以纳言”的“工”指乐人^⑫。这向我们透露了“纳言”工作的承担人是乐工。正如上

引《尧典》资料所示:被任命的纳言职官是“龙”,也正是乐官。相关的背景资料可以充分证明早期文献中所谓“宴龙”“飞龙”也都与音乐有关。^⑬再联系前面《周礼》所云的大司乐教授国子“乐语”的资料,可以得出纳言之言一定是仪式用语而不是日常用语的看法。《皋陶谟》所云“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也可以作为这个认识的证据。

关于“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条文献资料同样被《史记》《汉书》《隋书》等多种典籍载录,存有多种异文,今采用的是《尚书校释译论》的考证成果。其次,我们再来讨论“出纳五言”的问题。关于“五言”的内涵问题,可谓众说纷纭,参考《尚书校释译论》的考订,比较有影响的说法大概有三种:一是孔传的说法“出纳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⑭,它将“五言”解释成了“五德之言”;二是《汉书·律历志》的说法,“歌咏五常之言”^⑮;三是苏轼的说法,《东坡书传》说:“五言者,诗也。以讽咏之言寄之于五声,盖以声言也,故谓之五言。”孔安国和班固将“五言”解释成“五德之言”和“五常之言”显然带有后世儒家思想的色彩,不是“出纳五言”的古义,而苏轼说“五言者,诗也”却是高明的看法,指出了这里的“纳言”不是普通的讲话,而是“讽咏之言寄之于五声”。顾颉刚对之也有深入的分析:“此‘出纳五言’,即《尧典》之‘纳言’。而纳言之术在于用六律、五声、八音,其为藉歌咏以讽谏明矣。”^⑯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它告诉我们“纳言”之“言”不是日常用语,而是在有音乐等伴奏之下的“讽咏”,是特定场合的韵语,也就是上古时候的“诗”。所以,负责纳言的人,要懂得声律,要具有特定的技艺。这就是《皋陶谟》要把“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同“纳言”并举的原因所在。

关于“传语”(即讽谏)最为直接的史料,就是《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韦昭注:“百工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达,传以语王也。”^⑰在这里,“庶人传语”同“列士献诗”等构成了天子听政的内容。

正是有了“纳言制”和“庶人传语”这些制度的保证,才有了早期文献中的丰富的“言”与“语”资料。而且上面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中作为仪式活动的“言”与“语”,都不是一般人的言语,而是特定场合、特定身份的人的话语。^⑱以下《尚书》对“言”的记录

可以证实这个判断:

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④
(《尚书·汤誓》)

汝不和吉言于百性,惟汝自生毒,乃败祸
奸宄。以自灾于厥身。^⑤(《尚书·盘庚》)

相时憺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
矧予制乃短长之命。^⑥(《尚书·盘庚》)

今民将在祗遘乃文考,绍闻衣德言。^⑦(《周
书·康诰》)

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海
言。^⑧(《周书·洛诰》)

文王周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
牧夫,是训用违。^⑨(《周书·立政》)

从上述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尚书》里面的“言”,都不是指普通人的日常说话,因为它涉及到“誓言”“吉言”“箴言”“德言”“海言”“庶言”。其中“誓言”,指军事首领在战前的训话,所谓“军旅曰誓,会同曰诰”^⑩是也。今文《尚书》尚录有《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等。“箴言”,据孔安国传“尚相顾于箴海”^⑪,可知“箴言”是教诲的语言。“海言”,据孔安国传:“成王尽礼致敬于周公,求教诲之言。”“庶言”即教令^⑫。上述引言说话者涉及商汤、盘庚、周成王、周文王等王公要员。更为直接的证据还有:“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⑬(《尚书·汤誓》)“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⑭(《尚书·盘庚》)这里的说话人都是“王”,这里的“言”都具有无上的权威性。据统计,“朕言”一词见于《周书》共三次,分别见于《顾命》和《吕刑》^⑮。

上面引述的资料表明,上古时代“言”“语”的话语权在于王公要员,而这些话语有别于后世的谈话等日常用语,因为只有那些关乎家国大事的事情才会被记录下来,构成上古“言”“语”的主要内容。

综合以上讨论,《礼记》等说到的“语”发生在礼乐仪式——“祭礼”之上;而“言”则发生在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之时,比如《尚书》就留下了大量的战前训话的“誓言”^⑯。正所谓“国家大事,在祀与戎”^⑰。也就是说,作为早期文献中记录的“言”与“语”,要么发生在特定的仪式场合,要么发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即特定人员在特定场合的言说。

二、作为思想知识资源的“言”与“语”

正是因为上古时代祭祀诸仪式活动的繁富,也正是因为存在“工以纳言”“庶人传语”等讽谏机制,才产出了大量的“言”与“语”。这些言语成了上古最

重要的口传知识,广泛流传。在楚国甚至还专门设置了“语”科目的教育活动。我们可以想见,对当时的贵族子弟来说,“言”“语”是非常重要的知识,也是他们在诸如外交、祭祀、宴饮等公共场合所需掌握的重要技能^⑱。这也是“语”作为一种早期知识广泛传播最直接的证据。这个资料载录在《国语》中。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楚语上》)^⑲

我们今天无法确切考释这些知识在“申叔”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书写文献,还是尚处于口传系统之中。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语”和“春秋”“世”“诗”“礼”“乐”“令”“故志”“训典”一起构成了当时楚国王公贵族弟子学习的主要知识,被称为“楚国九门学”。同样,“言”也曾作为贵族子弟教育的知识而存在。《国语·晋语九》曰:“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训,重之以师保,加之以父兄。”^⑳考之《周礼》、《左传》等典籍,师、保是教育贵族子弟的职官^㉑。那么,《国语·晋语九》所云“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之中的“言”就是指教授给小孩子的特定知识。另外,上引材料中的“言”又和“典刑”“教训”相对应。这样看来,“言”确实是教育贵族子弟的知识材料。这个论断也可以在出土文献中得到印证。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后整理成《信阳楚墓》出版,其中编号1-03的简上记录了与教育相关的内容。李零释读作“教言三岁”^㉒。这里的“教言三岁”,与同一竹简的上下文“教书三岁”“教射与御”等,构成了早期贵族教育的基本内容。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言”“语”曾作为教材教授给贵族子弟,因此教学活动成了言语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散见于早期典籍中的语曰、言曰等资料则告诉我们,“言”“语”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后人著述时候的征引。于是,这些产生于仪式等重要场合的言语,就成了言说者立说的依据和思想知识来源。例如在早期文献《尚书》《左传》《国语》等中有以下记录:

迟任有言曰:“有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③(《商书·盘庚》)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④(《周书·牧誓》)

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艾夷蕪崇之,绝其材民,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⑤(《左传·隐公六年》)

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⑥(《左传·僖公十五年》)

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⑦(《左传·宣公十五年》)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夫子言之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⑨(《左传·哀公十六年》)

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⑩(《国语·周语中》)

人有言曰:“兵在其颈。”^⑪(《国语·周语中》)

人有言曰:“择臣莫若君,择子莫若父。”^⑫(《国语·晋语七》)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⑬(《国语·晋语八》)

这一直延续到诸子时代,大量的子学文献还在引述上古“言”“语”知识,或作为经验哲理,或作为立说的依据,以帮助自己著述立说。例如《老子》《韩非子》等。《老子》第四十二章云:“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大方无隅,大器晚成……道隐无名。’”^⑭老子引用《建言》的话阐述了自己“大器晚成”等思想主张。《韩非子·备内》:“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韩非子引用“语曰”资料以佐证他关于两种没有血缘关系的“君臣”“夫妻”之间应如何处理好关系的道理。又《饰邪篇》引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在这里,韩非子指出了国家需要一套完整而稳定的法律,不可信从巧言者的意愿而失去常法。

汉初刘向编纂的史料集性质的《说苑》《新序》等典籍中也保存了大量“语曰”材料,并且数量很多,可见上古口传知识的“言”与“语”很好地被保留下来,并进入了书写文本。以下“语曰”资料都来自《新序》与《说苑》。

语曰:“仁不轻绝,知不简功。”^⑮(《新序·杂事》)

语曰:“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⑯(《新序·杂事》)

语曰:“唇亡则齿寒矣。”^⑰(《新序·善谋》)

语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见未萌,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⑱(《新序·善谋》)

语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

语曰:“知命者不惑。”^⑲(《说苑·权谋》)

语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车不作之马,趋疾而致远;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远中微。”^⑳(《说苑·指武》)

又有以“谚”为形式被引用的“言”与“语”,虽然称为谚语,其实也是“言”“语”的另外一种形态。这一点很被早就被杜预和韦昭注明了。这些用法在早期典籍中也广泛存在,主要分布在《左传》《国语》《说苑》《新序》等典籍中。比如:

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㉑(《左传·隐公十一年》)

谚有之曰:“脱饭不及壶珍。”韦昭注:“谚,俗之善语。”^㉒(《国语·越语下》)

谚曰:“诚无垢,思无辱。”^㉓(《说苑·敬慎》)

谚曰:“有白头而新,倾盖而故。”^㉔(《新序·杂事》)

周谚曰:“囊漏贮中。”^㉕(《新序·刺奢》)

在以上资料中,有杜预和韦昭对“谚”的解释:“俗之善语”之“俗”字,向我们透露了“谚”是流传在民间的“俗语”,所以可以说,“谚”是早期“言语”的另外一种形态,不同于收录在《尚书》《左传》等官方文献中的“言”“语”。这显示了早期知识的层次性和等级性。这就是春秋时期孔子所指出的“雅言”与“俗谚”的分野。《论语》录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㉖的说法。言外之意,在诵读《诗》、《书》、执礼等经典之外,孔子使用非日常用语(即雅言)说话、谈论。这就是早期中国社会中的雅与俗的两分。

综上,分析上述早期典籍征引的“言”与“语”,分析它们的语法,可以看到它们大多都是韵语,即便有些文句字数不一,却都很简洁,且偶数句多使用对偶修辞格(比如“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谚曰:“诚无垢,思无辱。”)。这些特征都暗示了“言”“语”作为口传知识的基本特色便于记

诵。它们之中的有些言语被多种文献引用,比如前面所引述的成语“死而不朽”“唇亡齿寒”等等。所以,从功能的角度看,它们作为知识资源被广泛传播和使用,并且多作为格言警句和历史经验等用作著述立说的依据。

三、作为文体的“言”与“语”

上面两节分别讨论了早期仪式上的言语活动,正是这些活动产生了大量的“言”和“语”。这些口传知识一代代传承下来,加上上古政治中的“纳言”和“传语”制度,保证了“言”和“语”的不断产出。随着书写手段的不断进步,上古口传知识的“言”和“语”也就作为当时知识阶层重要的知识被记录下来。所以直到刘向整理汉家图书时,他还能看到这些资料^⑥。随着这些知识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言语文体,并逐渐累积,出现了与之相关的典籍。

《国语·周语上》记录有早期社会的政治讽谏制度,其文曰: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瞽诵,百工谏,庶人传语。^⑦

这则文献被反复使用在多个学科的研究之中。其实,它与那段著名的“大夫九能”^⑧一样,都向我们暗示着早期文体与职官的深刻关联。因为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来,这段话中的“语”同“诗”“箴”“赋”等处于同一逻辑平面上,它们都是后世的文体名,被记录在《文心雕龙》等早期文体要著之中。春秋战国时代,“学在王官”被“礼坏乐崩”的大势所摧毁,周代建立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式微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任何一种文化时代结束之后,它的一些特色仍会在新的时代中得到保存,甚至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言”与“语”就是例证。在这个时期,“言”与“语”经历了作为人的行为动作名,最终成为一种同“诗”“赋”等并举的文体。其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的以“言”与“语”为篇名、书名的典籍。

依据现存典籍、《汉书·艺文志》以及考古出土资料对先秦典籍篇名进行一次清点,可以得到下表(见表 1)。

这个表格展示了早期“言”与“语”文体,经过发展、累积,最终出现了这么多以“言”与“语”为篇名、书名的典籍的情况。这些典籍多是产生于诸子时代的子书,可见诸子在学习和继承上古“言”“语”知识资源以立说的同时,也在学习模仿上古“言”“语”的方式进行著述立说。正是他们的工作,才有了上表所显示的篇目和典籍。同时,这也意味着作为上古重

表 1

篇 名	出 处	备 注
《建言》	《老子》第四十二章引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大方无隅,大器晚成……道隐无名。’”《老子校释》引奚侗:“《建言》,当是古载籍名”,又引高亨:“《建言》殆老子所称书名也。” ^⑨
《法言》	《庄子·人间世篇》引	《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⑩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引林希逸说:“法言者,古有此书者也。” ^⑪
《逸言》	《鹖冠子·天权篇》引	《逸言》曰:“章以祸福,若合符节。” ^⑫
《嘉言》	《孔丛子》	该篇为《孔丛子》的第一篇,共记录了七段孔子的故事。每段以孔子的评论结束。
《符言》	一在《文子》,一在《鬼谷子》	《荀子性恶篇》云:“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今按:《符言》收录的都是治国等的大义。
《阴言》	《鬼谷子·谋篇》引“阴言有之曰” ^⑬	
《霸言》	《管子》	
《壹言》	《商君书》	
《谰言》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汉志》儒家著录《谰言》十篇、《儒家者言》十八篇。又出土文献有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定县竹简《儒家者言》。
《道家言》、 《法家言》、 《杂家言》	同上	《汉志》著录“《道家言》二篇。《法家言》二篇。《杂家言》一篇。”
《太公言》	同上	《汉志》著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注曰:“《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论语》	《六艺略》	《汉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国语》	《六艺略·春秋》	全书由《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部分组成。
《事语》	《战国策书录》	据刘向《战国策书录》,《战国策》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诸名。
《春秋事语》	长沙马王堆汉墓	书名系整理者所加。

要仪式上的乐语之一的“言”与“语”^⑥,经过发展,最终稳定下来成为“言”体、“语”体这两种重要的文体。表现在典籍上就是大量言语体文献的出现。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的考察,我们认为区别言和语,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研究早期文献篇名来揭示早期存在的“言”和“语”这两种不同的文献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它们产生的过程不同,也就是言语方式不同,后者需要辩难、讨论而前者不是;更重要

的意义还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早期文体产生的过程:从有相应的职官和特定制度保证之下的“言语”行为,到这种行为积累下来“言语”知识,最终定型为“言语”体典籍。这个认识提示我们注意早期职官与文体之间的深刻关联,以及注意观察文体生成的发展过程。换句话说,早期文体的生成要经由一条漫长的道路,绝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时期的天才创制,更不是后世文人案头上的偶然发现。它们同早期宗教仪式、早期政治制度等有着深刻的关联。

注释：

- 的意义还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早期文体产生的过程:从有相应的职官和特定制度保证之下的“言语”行为,到这种行为积累下来“言语”知识,最终定型为“言语”体典籍。这个认识提示我们注意早期职官与文体之间的深刻关联,以及注意观察文体生成的发展过程。换句话说,早期文体的生成要经由一条漫长的道路,绝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时期的天才创制,更不是后世文人案头上的偶然发现。它们同早期宗教仪式、早期政治制度等有着深刻的关联。
- 注释:**
- ①②⑩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4、217、112页。
- ③谨按:当代学者这类错误看法有很多。不仅对于“赋”体如此,对“铭”也如是。比如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专设“铭箴篇”来谈这两个文体。学者过常宝却批评它,认为:“刘勰混淆了文体意义上的‘铭’和实际行为的‘铭’。”(详参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
- ④⑬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1、899页。
- ⑤⑥⑨⑩⑪⑫⑬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册,第1194、1196、1144、1964、1724、1724、1724页。
- ⑦详细的论证,参考本文后面的关于“诵”的研究。
- ⑧《毛诗序》云:“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之殷富。”
- ⑨孔氏云:“都邑则用箴,国都则卜也。”
- ⑩关于“施命”,孔颖达云“田能施命者,谓于田猎而能施教命以发誓,若《士师职》云:‘三曰禁,用诸田役。’”这就是说大夫在举行打猎仪式之前宣读王之禁令、设定田猎规则等。关于“造命”,孔颖达云“随前事应机,造其辞命以对”,即在出使等场合,大夫不必拘泥于王之命辞,而应随机应变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 ⑪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6页。
- ⑫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89页。
- ⑬原文是“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谨按:从文本逻辑上看,“乐语”同“乐德”“乐舞”一道,构成了国子所要掌握的仪式技能,它们都是在礼乐场合之下的特定要求。
- ⑭“倍文曰讽”,《汉书贾谊传》颜师古注曰:“背读曰背。”
- ⑮《仪礼注疏》,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011页。
- ⑯《礼记·中庸》有“旅酬下为上”云云,朱熹注曰:“旅,众也;酬,道饮也。旅酬之礼,宾弟子兄弟之子各举觞于其长而众相酬。”
- ⑰《礼记正义》,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87页。
- ⑱《礼记·礼器》云:“尊者举觞,卑者举角。”
- ⑲“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
- ⑳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58、1014页。
- ㉑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538页。
- ㉒原文是“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 ㉓原文是“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 ㉔原文是“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 ㉕其文曰:“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远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也。”
- ㉖顾颉刚等:《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2页。
- ㉗⑤⑥⑦⑧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7、199、295、427、566、883页。
- ㉘《北堂书钞》,四库全书本,第59卷。
- ㉙孔颖达疏:“《礼》通谓乐官为工,知工是乐官。如《周礼》大师、瞽矇之类。”
- ㉚《山海经》:“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吕氏春秋·古乐》:“帝颡项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颡项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据《大戴礼记·五帝德》尧帝时候有“伯夷主礼,龙夔教舞”的说法。注曰:“龙夔,二臣名。舞,谓乐舞。”
- ㉛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5页
- ㉜《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2页。
- ㉝刘起釭:《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一册,第452页。
- ㉞⑥⑦⑧徐元浩:《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449、78、410、11页。
- ㉟据统计,“言”字在《周易》中出现了12次,在《尚书》中出现了31次,在《诗经》中出现了119次,其中87次为语气助词等虚词。这些表实义“言”字,都是在特定场合下重要人的言说。(统计可参邱渊《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打印稿,第43页。)
- ㊱④⑤⑥⑦⑧刘起釭:《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册,第884、941、941、878、904页。
- ㊲⑦⑧④刘起釭:《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册,第1309、1457、1098页
- ㊳刘起釭:《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册,第1675页。
- ㊴马融注,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55页。
- ㊵孔安国注,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9页。
- ㊶可参,江瀚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8页。
- ㊷《顾命》有“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吕刑》有两处,分别是“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命”;“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 ㊸今文《尚书》录有《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等。
- ㊹《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911页。
- ㊺所以《论语》载有孔子的话,“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言”显然不是日常意义上的说话,而是在仪式诸公共场合的说话。

- ⑤⑨韦昭注“语”为“治国之善语”。见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 年，第 485 页。
- ⑥⑪在《周礼》设有“师氏”，是地官司徒的属官，掌教国子；又有“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左传》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成公九年）；又：“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襄公十三年）。
- ⑥⑫李零《长台观楚墓〈申徒狄〉研究》，见《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80 页。
- ⑥⑬孔安国传曰：“迟任，古贤”，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本，第 169 页。
- ⑦⑩谨按：贾逵曰：“先民，古贤人也。”（《国语集解》，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52 页。）
- ⑦⑬《国语集解》，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22 页。谨按：“死而不朽”又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前面已经引述。可见这个成语流传的广泛。
- ⑦⑭《老子校释》引奚侗：“《建言》，当是古载籍名”，又引高亨：“《建言》殆老子所称书名也。”（参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68 页。）
- ⑦⑮⑦⑯石光瑛：《新序校释》，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346、1157、833 页。
- ⑦⑮《新序校释》，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551 页。谨按：这句话在战国时期有广泛的流传，《战国策燕策》亦引之。
- ⑦⑰《新序校释》，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1106 页。谨按：“唇亡齿寒”这个成语在战国文献中多见，比如亦见之于《庄子》《左传》《战国策》等等。
- ⑦⑱⑲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12、369、240 页。
- ⑧⑱《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04 页。杜预注：“谚，音彦，俗言也。”
- ⑨⑲《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652 页。
- ⑨⑳《新序校释》，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394 页。谨按：这句话亦见于《说苑》。
- ⑨㉑孔安国云：“雅言，正言也。”郑玄云：“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礼不诵，故言执。”
- ⑨㉒表现在典籍上就是在前面所给出的《说苑》《新序》等刘向编订的书中存在大量的“语曰”“言曰”资料。
- ⑨㉓《诗·邶风·定之方中》《毛传》曰：“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 ⑨㉔参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68 页。
- ⑨㉕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157 页。
- ⑨㉖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24 页。
- ⑨㉗黄怀信：《鹖冠子汇校集注》，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369 页。
- ⑨㉘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62 页。按：许氏断句有误。他的断句是“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不通。这是不明古书之通例也。当断为：“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
- ⑨㉙据《周礼》，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责任编辑 杨捷]

Yan and Yu: An Observation about the Early Days of the Style Formation

CHEN Xu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From a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of early official: "yanyu" activities, their age as "yanyu" to the thought resources and Zhou, "yanyu" literature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 can see the early style of the generated one important way, which is the official system operation caused "yanyu" continuous output of knowledge, and their citation times ("yanyu" as a thought resource), imitation ("yanyu" as a mock object), directly caused the early "yanyu" kind of texts, and this is the very best stabilized "yanyu" style embodiment and guarantee. In short, the early style of writing i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he name of human behavior to the name of style, while the symbol of stylistic stability is related literature.

Key words: yanyu; early style; officials; Time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